

域外之“眼”与高本汉之“圆”

□ 李无未

中图分类号: H0-09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6.03.001

多少年来,一些人习惯性地认为,中国的汉语史就应该由中国学者利用中国的汉语文献来研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你想想看,中国人嘴里说的是汉语,中国人用自己的汉字记录了自己的语言,久而久之,就成了中国自己的汉语文献。当然人们也相信,只有中国人才能凭语感最准确地理解中国汉语文献,不用自己国家的汉语文献研究汉语,难道还需要用别国的文献研究汉语吗?

按照这个思维模式,研究先秦汉语语法、词汇、语义、文字、语音历史,一定要由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献《诗经》《左传》《楚辞》等,抑或是《尚书》《周易》《仪礼》等儒经也可以,反正都是中国学者考订的结果,不是伪书就行。所能利用的工具书,最好不要超出中国《尔雅》《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广韵》,抑或是《康熙字典》的范围。经学是关注的中心,中国一切人文学术都围绕着经学转,读经、解经才是正统的学问,传统小学当然也不例外。清代文人惧怕惹上了“文字狱”大祸,解经则更为小心,不敢离开故纸堆半步,钻进故纸堆搞考据,那就是等于“性命”上了保险锁,进了保险箱。

清末“西学东渐”,如此则“维新变法”迫在眉睫,洋学似乎派上了用场,但也只能按张之洞在《劝学篇》所设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章法去做。汉语研究也是如此,很难走出这个思维定势。比如章太炎用汉字构拟古音韵部的音值,《成均图》用汉字来表述“音转”关系,都是“西学为用”的典范。就连“音值”这个洋玩意儿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得换成中国文字的面皮,不然就会被安上个“离经叛道”的罪名,很难混迹于世。还记得汪荣宝吧?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

学归国后,异想天开,研究汉语音韵学就不那么安分守己了,1923年发表了个《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论文,利用梵汉对音去考证了上古音鱼部读[α],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古音学的大辩论。谩骂他的人不少,还是因为他破坏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风规矩。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力这一批人留学欧美回国,似乎打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规矩,但还是不得不在“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之间徘徊。因为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毕竟会走得太远、太突然,让国人心理上接受不了。《中国音韵学》是“旧瓶装新酒”。王力是实验语音学出身,以一本《博白方音实验录》获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当然,他对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术语内涵要按照西方现代语音学理论加以改造,重新作注脚。同时,对如日中天的高本汉(Klas Bernhal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现代音韵学理论有所吸取。所以,许多人称赞他是将传统的“小学”,即所谓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的“典范”。大概这也是说他离不开“旧瓶装新酒”的意思。

《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语音史》是不是“新瓶装旧酒”?在汉语学史上,中国人没有这种明确的“西式历史学”观念。中国的“西式历史学”不是20世纪初从罗振玉影印日本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开始的吗?用“西式历史学”观念研究汉语史,很自然,在形式上要符合“西式历史学”规范。比如王力写《汉语史稿》和《汉语语音史》讲分期、讲共时、讲历时、讲音变、讲音系特征,这些理论和术语哪个不是“舶来品”?但其毕竟是用中国文献的“瓢儿”填充的,比如先秦音系,主要用《诗经》《楚辞》用韵;讲

隋朝—中唐音系，抛开《切韵》，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所以中国文献这个“酒水”没有变。但总体来看，王力先生研究汉语史，以“域内”文献为主，基本上走的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线路。

用“西式历史学”观念研究汉语史，这就是制作了“新瓶”，但能不能在“新瓶”里也装上“域外文献”的“新酒”，即是在汉语史这个“新瓶”里用“域外文献”的“瓢儿”填充？许多学者还是有点胆怯。如果真的是这样做，那个研究里外都姓“洋”，那就说明真的完全西化了，肯定会有人说是太离谱了，在中国汉语学史上，还很少有人敢这么做。

1929年10月，罗常培在鼎鼎大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上发表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他用大量篇幅表扬了中国明代时外国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等人，说他们为汉语语音的研究立了大功。因为他们用了罗马字给汉字注音，还用了罗马字标记汉语官话语音，这就离汉语官话语音实际音值标记不远了，在中国肯定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不过，罗常培也感到很遗憾，因为注意他们研究成果的中国人不多，只有方以智、刘选杞、刘献廷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但就是这几个人，也还是不敢“新瓶”装“新酒”，因为当时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主流观念还是用汉字反切标记汉字字音，尽管他们也知道反切标记字音不准确。当时有一本很流行的韵书叫《音韵阐微》，其作者就试着改一改旧反切规则，但无论如何，它用中国汉字作主要标音工具的操作流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方以智这些人明明知道罗马字标记汉字字音很便利，但如何敢因此而惹圣上大怒？所以，罗常培感叹当时用西洋音标符号来贯通中国韵书的中国人极少。其实，这是有原因的。但不论如何，罗常培还是感到有一点儿欣慰，因为利玛窦、金尼阁等洋人毕竟是做了“下开马伯乐、高本汉先路”的工作。

高本汉是幸运的，当然也属于例外。中国人似乎早就忘记了他是瑞典人的“洋身份”，习惯于认同他姓高，把他当中国人对待。为何高本汉偏偏有这样的“吉星”高照？这是因为，高本汉虽

然也在“新瓶”里装上“域外文献”，比如传教士方言调查报告里用罗马字标记的字音、日本假名标记的吴音和汉音，以及字喃或罗马字母标记的越南汉字音、谚文标记的朝鲜汉字音“新酒”，但同时他还没有忘记装上“域内文献”的“旧酒”。高本汉就是利用《广韵》及宋元韵图等传统汉语音韵学的材料当“旧酒”的。就是制作“新瓶”，他在运用历史语言学理论“构拟”音系的同时也不忘记掺和上汉语等韵学理论，以及《广韵》反切语音分析模式。让人一打眼儿就相信他还是“旧瓶装旧酒”，这就很容易为中国学者心理所接受。高本汉学术上的狡猾和懂得“世故之圆”的“明理”就体现在这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你不服气行吗？

当下中国学者中，研究汉语史，标榜“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还大有人在。但在“新瓶”里装上“新酒”的过程中，是不是还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比如有学者发现了1850年到1950年期间欧洲巴色差会（the 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记录的中国汉语客家话材料，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用它们来研究汉语近现代客家话史呢？还不行，因为这些材料背景十分复杂。刘镇发教授说：“传教士来华的初时，客家语只有口语，没有书面材料。传教士只能靠耳朵听到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做记录，制定一个罗马字的书写方式，工作十分艰巨。后来，发现罗马字不容易在华人社会间流传，又要改为使用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中文字，所以，初期的汉字版是错漏百出的。”后来，又继续调整，加上标准中文的字和词汇，这才步入正轨。不加分析地使用这批材料研究汉语近现代客家话史，可信度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就必须在整理“文本”文献与借助中国“活的方言”文献材料结合上下功夫。不然，所做研究结果必定会“剑走偏锋”而无法出奇制胜。那样的话，“西学为体”在这里就只是个“花架子”，好看中不用；而“中学为用”的近现代客家话史面貌也难以落到实处，汉语史研究界不会“买账”也就可以理解了。

以“域外”之“眼”研究汉语史，在当下的中国汉语史学界越来越红火，这恐怕是当年罗常培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情形。但研究的升温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后，需要我们冷静地进行反思。

当年，许多学者信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原则，后来又改为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就是看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剑走偏锋”的弊端。如此看来，在利用域外文献进行汉语史研究的过程中具有高本汉之“圆”的思维方式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并不是说在利用域外文献进行汉语史研究的过程中具有高本汉之“圆”就是无可挑剔的唯一正确选择，汉语史研究如果都是去运用这样的“圆”思维，是不是会落得个尴尬的学术“市侩”的名声？

比如说，研究清末北京官话口语词汇史时，有学者利用了日本明治时期课本文献，比如《官话指南》《日汉英语合璧》《北京官话谈论新编》《燕语生意筋络》《言文对照北京纪闻》《日清会话语言类集》《北京官话常言用例》《北京官话清国民俗土产问答》等。这些文献大多数都是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合作编写的，可信度很高。按照常规研究套路，对这些文献进行定性与定量处理，区分口语词、常用词语、外来词语，以及特别学科领域的词语类别。然后，再做静态和动态的历时和共时描写，以便突出北京官话课本词汇的特点。在具体研究时，肯定也要注意结合中国本土文献来研究，比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以及现今学者编写的《北京方言词典》《北京话词语》《北京土语辞典》《北京话儿化词典》等，似乎做到了万无一失，足以称得上研究模式上的“圆”。但这样研究，顾及了清末北京官话口语词汇史的研究，却忽略了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文献有日本人参与的域外特质，比如“中介语”造成的“偏误”还时不时地冒了出来。杨杏红就曾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口语课本语言出现的词法偏误而有所议论，她举例道：“这个表的箱子很好看”就是个病句。“箱子”应该改为“盒子”。日语“箱”，对应的词就是“盒子”，很显然这是作者受日语影响导致名词用法出现了偏误。次如：“我实在是忏悔”，也是个病句。“忏悔”应该改为“懊悔”。“忏悔”常用动词词性，而“懊悔”则是形容词。作者因为忽略了词性差异而出现了错误。再如：“夏天有多么舒服啊！”也是个病句。作者误将感受作为一种存在，所以，就使用了动词“有”，也是很蹩脚的句子。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文献词汇表现不

平衡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许多人都知道，北京官话和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重要区别点就在于“儿化词”特别多。但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各本书“儿化词”存在形态却不一样。比如《官话指南》时间名词儿化：今儿49例，明儿15例，昨儿24例；而《日清会话》时间名词儿化则是：今儿14例，明儿3例，昨儿3例。很明显，《日清会话》有意消弭了“儿化词”的表现力，人为规范的味道很浓。作者为何如此写？这确实是值得进一步探求的。

从世界汉语教育史“国别汉语学习”来看，这些差异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定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时不可避免出现的特有现象。我们关注它，肯定与在汉语史研究中去建构北京官话口语词汇史的目的和角度有所不同。

由此看来，高本汉这个汉语史研究的“圆”是有缺陷的，很难让人满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汉语史研究中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今天的汉语史研究，无论是以“域外”之“眼”，还是以“域内”之“眼”，都不可能整齐划一。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文献，只有多元并存，多元共举，才能对汉语史研究有新的创造。无论是颠覆式创造与模仿式创造，还是抛弃式创造与拓展式创造，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轻易否定。

1938年8月，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圣彼得教堂召开，胡适代表中国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他在介绍中国史研究的新材料时，提及了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除上述四种文献之外，胡适又提出了第五种重要文献，即藏于日本、朝鲜等国的中国人所做的史料，也是新发现。我们就此可以对胡适的发现做一个补充说明，就是中国史研究的文献还有“第六大发现”——域外之人，即非中国人所做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文献。我们已经知道，“域外”之人用域外之“眼”看中国，新发现极多，内容也极其丰富。由此就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资源宝藏。用“域外”之眼看中国和用中国人之眼看中国总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域外”之人用

域外之“眼”看中国，总好像隔靴搔痒一般，毕竟隔了一层，说不到点子上。这话是否有道理，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才行。从汉语史研究来说，“域外”之“眼”是否也是“隔了一层”，许多人并

不太在意，而是否能具有高本汉之“圆”思维才是人们更为关心的，毕竟这对研究结果至关重要。尽管这个汉语史研究之“圆”并不完美，但聊胜于无，是不是这样呢？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

秋叶

莱顿大学汉学院 (Sinolog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eiden) 曾是欧洲最大的汉学院之一，其中文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笔者 2014 年曾到访该中文图书馆（当时已改名为“东亚图书馆”，现归入大学图书馆顶楼正在建设的亚洲图书馆）的珍藏馆，在馆员高柏先生的接待下参观了木格子书架上的大量中文文史著作，尤其对收藏有荷兰汉学家高罗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 全部藏书及遗稿的“高罗佩专藏”印象深刻。但近年来，汉学院已不复存在，被归类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 (Leide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研究重点在亚洲与中东地区) 下属的亚洲研究学院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的中国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中国研究系分本科项目与研究生项目。本科专业为“中国语言与文化” (Chine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研究生专业为亚洲研究 (Asian Studies) 名下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 (Chinese Studies)。与中国研究相关的研究机构有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 (Leide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以及国际亚洲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后者为一所跨校合作的研究机构。研究生可以选择政治学、宗教学、艺术与物质文化、语言与文学等任一与中国相关的学科从事研究。研究院鼓励进行跨区域比较与跨学科研究。

中国研究系现有教授 5 位，讲师 16 位及研究员 2 位，不管从教师队伍还是学生数量上在欧洲均名列前茅，其教学质量与研究成果也具有崇高声誉。现将五位正教授简介如下：弗兰克·皮埃克 (Frank Pieke)，现任亚洲研究学院与中国研究系学术主任 (academic director)，当代中国研究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与欧洲的中国移民及近年中国的外国移民问题，著有《出色的共产主义者：今日中国的精英训练及国家建设》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2009) 等；冯·克莱维 (Maghiel van Crevel)，前任亚洲研究学院与中国研究系学术主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诗歌，著有《思维、暴力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 2008) 等，主编莱顿大学《中国丛书》 (*Sinica Leidensia*)；德维尔特 (Hilde De Weerd)，中国历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的思想、政治史，著有《信息、领土与网络：宋代中国的危机与维护》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2015) 等；安娜·格理森 (Anne Gerritsen)，莱顿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文化、江西陶瓷与烧窑史等，著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吉安文人与地方》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2007)；思贝斯玛 (Rint Sybesma)，中文语言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文及方言的句法，著有《四类中文的量词》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Guglielmo Cinque and Richard Kay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New York: OUP, 2005) 等。

本期重要作者李无未简介

李无未，1960年生于吉林敦化。现任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文系主任；曾任日本、韩国、越南、法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78）。研究领域为中外汉语学史、汉语音韵学、中国古代礼制等。已出版著作：《中国历代宾礼》（1998）、《音韵学与音韵学史》（2005）、《汉语音韵学通论》（2006）、《周代朝聘制度研究》（2006）、《宋元吉安方言研究》（2008）、《日本汉语音韵学史》（2011，获王力语言学奖）、《汉语史理论范畴纲要》（2012）、《东亚视阈汉语史论》（2013）、《日本近现代语法学史》（2016）等；即将出版著作：《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等；主编有：《中国历代礼仪制度文化丛书》（1998）、《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与总目》（2007）、《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2008）、《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2011）、《海洋文明与汉语言文字书写》（2012）、《东亚汉语史书系》（2013年至今）、《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戸明治编，60册，2015）等大型工具书和文献资料集；发表论文140余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